



血雨腥风应有涯

1926年秋天至1927年春天,南中国大地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原先被人看成是毫无生气的农村突然沸腾了,到处是锣鼓声、呼喊声。这可不是那种过去逢节日才出现的庙会或社戏,而是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掀起。敲锣的不是戏子,而是被农民押解着游乡的土豪们。这些昔日威风八面的地方土皇帝们,如今一个个戴着纸糊的高帽子,在泥腿子们的厉声吆喝下,不得不自己在锣声中低声下气地喊着:

“我是土豪×××!我有罪!”“我是劣绅×××!我有罪!”

到处是红旗招展,旗子上的图案是木犁——最典型的中国农村特色。望着犁头旗下发生的农村巨变,社会上的人骤然分成两派:

一派高呼“好得很!”并奔走呐喊。

一派大骂“糟得很!”正咬牙切齿并磨刀霍霍。

这些,决定了1927年夏天湖南大地上的那场血雨腥风的不可避免,也注定了当年秋天暴动的义旗会高高举起……

|| “湖南农王”返故乡 ||

1926年12月17日,粤汉铁路长沙车站上鼓乐声声,湖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数百名代表,正在这里欢迎一位重要人物。

陈旧的蒸汽机车头发发出轰鸣声,吃力地拖着车厢进了站,欢迎的人群中立即发出阵阵口号声:



红色起点

HONGSE QIDIAN

“欢迎中央委员毛先生来省指导！”

“向农民运动前驱毛先生致敬！”

口号声中，从车厢走下一个高个子且有些瘦削的三十多岁的人，一面向大家招手，一面以浓重的湖南口音高呼：

“工友们万岁！”

“农友们万岁！”

这就是后来闻名于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当然，此刻他的知名度还远不能与后来相比，不过在湖南还是大名鼎鼎。

长沙的中共党组织负责人熟悉他，因为六年前他是湖南共产党小组的创始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第一任书记。

长沙的工人代表们熟悉他，因为是他于1922年就开始组织织造工人、泥木工人进行罢工，并于当年到安源煤矿开展工运。

湖南农民运动的负责人更熟悉他，许多人是他在广州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又是他，一年多以前在家乡韶山最早组织起农民协会。为省内农运首开先河。如今，农民协会已经遍布全省，有200万会员……

毛泽东此时对外还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长沙市党部也派人前来迎接。其实，这时的国民党湖南地区组织，主要由“跨党分子”即兼有国民党籍的共产党员占主导地位。

当时任湖南省国民党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夏曦，就是中共湖南省委委员。他当年在毛泽东主办的新民学会中是晚一辈的会员，又是毛泽东任校长的自修大学的教员，可以说是老下属了。

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这时已是中共第四届中央委员，而毛泽东在“四大”上没有当选中央委员。不过李维汉还是以对兄长的态度十分尊敬地迎接这位“润之兄”。

十年前李维汉考上湖南省第一师范时，就结识了比他高两届的毛泽东，以后又参加了这位师兄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三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
中央秘书长李维汉



年多以前毛泽东调到中央任秘书兼组织部长时，是李维汉从法国留学回来接任了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之职。见到这位当初自己接受新思想的引路人和党内职务的前任后，李维汉格外高兴，毛泽东也以特别热情的态度对待这位欢迎者。

外人不知道的是，就在几天前，李维汉到汉口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被主持会议的陈独秀狠狠批评了一顿。这位党的创始人以自己“家长”式的地位，指责李维汉主持的湖南区委在发动农民运动时犯“左派幼稚病”，并说：“解决土地问题，在目前也还只是宣传，不能马上实行。”

多数人附和陈独秀的意见，可是此时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却站起来表示不同意见说：

“湖南区委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应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们要帮助国民党左派，这是对的。可是要提醒中央注意，国民党左派没有掌握武装力量。在粤同志有人说，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几个月后，历史就证明了毛泽东的这番要注意“有兵”的话是何等有远见！有“一排兵”就可决定政治斗争的力量对比，枪杆子是多么重要！湖南有号称10万的农军，也被证明挡不住以许克祥为首的一个团反动正规军队的袭击。可惜的是，当时毛泽东的这番话在中央没有引起重视。

由于有了几天前这次中央特别会议上共同的观点，毛泽东、李维汉二人这次格外相投。下车之后，毛泽东与国民党省党部简单应酬后，马上与中共湖南区委研究了如何进行自己下一步的工作任务——考察农民运动。李维汉、夏曦找人做了详细的安排，并请毛泽东参加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12月20日，在这两个大会上，毛泽东作为最受尊敬的外来人物受到欢迎，并应邀在大会上讲演。在那个革命的暴风雨时代，讲演是政治家必备的本领，而且要即席发挥。照本宣科读稿子，会被人认为是低能的表现。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站到主席台上的毛泽东，以习惯的讲演姿势，一面挥动手臂，一面大声地向台下说：

“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

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



红色年代

HONGSE QIDIAN

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的工资的时候。”

这就是当时这位“湖南农王”提出的斗争纲领。大会结束后，对外发出的报道如此描述道：

“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重。去岁回湘养病，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早。后为赵恒惕所知，谋置先生死地，先生闻讯，间道入粤。在粤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要职，此次革命军势力北展，先生为发展全国农运，奠定革命基础起见，遂于前月离粤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农民代表大会开幕时，曾电请先生回湘，指导一切，现已抵湘。”

这篇报道说毛泽东在韶山从事农运除衡山之外为湖南的“最早”，固然是对的。其实，衡山的农运也是在毛泽东创建的中共湖南区委领导下展开的，可以说湘境的农民运动乃至共产党领导的其他运动，都与毛泽东有关。

此时，回到故地，一情一景都令毛泽东难忘——橘子洲头、爱晚亭下、第一师范这些地方能勾起多少回忆，又培育出多少风华正茂的一代风流！那是一个需要巨人和产生巨人的时代，如列宁所说：“伟大的革命运动会造就伟大的人物”，毛泽东正是那个时代造就的巨人。

近代湖南，地灵人杰。20世纪初期，“中国如为德意志，湖南便是普鲁士”的豪言，曾在三湘志士中流行一时。

仔细研究中国近代史，人们可以发现，19世纪寻求真理的杰出中国人多出于广东，如洪秀全（更准确地讲应是他的族弟洪仁玕）、康有为、梁启超和跨世纪的伟人孙



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求学时的毛泽东

中山。20世纪的中国英杰却首推湖南，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士黄兴、陈天华、蔡锷外，更有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以及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中的三位——彭德怀、贺龙和罗荣桓。其中毛泽东更是在政治、军事成就上前无古人的一代奇才。

历史巨人出自三湘，并非由于远古时舜帝南下到此奏过“箫韶九成”，给





这座因韶乐而得名的山峰,以及山脚下的韶山冲带来过什么“王者之气”。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是存在决定意识。如同两块燧石相撞能迸出炫目的火花,两种文化的交合冲突点上往往会产生杰出的革命家和思想家。

19世纪的中国广东,正是新来的西方思想与古老的中华文明激烈碰撞之地。进入20世纪之后,广东、上海和武汉等处的殖民地化和西方文化弊端的影响日占优势,清王朝统治中心北京和西北内地又仍被封建腐朽的暮气所笼罩,地处广州、武汉之间的湖南则在新旧文化、东西思想的冲突中成为主要交会点。近代湖南星河灿烂的一代英杰,恰好在此背景下放射出他们自身的光辉。

清末民初的湘人,在国内诸省中又以尚武著称。当朝廷和官军对太平天国无可奈何之时,曾国藩、左宗棠等文人以“匹夫居间里,一呼蹶起,从者万人”,连同那个在任现职官的湘人胡林翼,用“保卫名教”的精神动员号召读书人,以重饷和打仗获利的物质刺激招募起“寒谷穷苦之民”。随后以儒生为统官,贫困愚昧之湘农为兵勇,创立湘军,出省征战十载,平定东南。后人虽然从政治上认识到曾国藩、左宗棠辈以知识分子和落后农民相结合建军的所谓“创举”,只不过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和反动王朝命运的努力,可是当年集文才和武功于一身的“曾文正公”,以及他名下标榜的“湘学”确实影响过一代湖南知识分子。蔡锷编《曾胡治兵语录》,名噪一时;毛泽东的导师和岳丈杨昌济,也极为推崇曾氏的“经世致用”之道。

毛泽东本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最佩服的人物也是曾国藩。毛泽东于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曾这样写道: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为三,……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观其收拾洪杨一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后来,当毛泽东接受了阶级分析的方法之后,毛泽东不再颂扬甚至极少提及曾国藩。

在中国,能不能争取“士人”拥护并参政,以及可否征集较多的农夫从军,一直是决定胜败的两个关键环节。出身于较为殷实的农民之家,长大后又出外求学的毛泽东,从青少年起就恰好具备了既熟悉农民又兼具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色这两方面的条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环境和历史就是这样选择了毛泽东。

靠家庭的资助和本人的勤奋,青少年毛泽东走完了从读孔孟之书的私塾,



红色起点

HONGSE QIDIAN

到新旧学校特色兼备的湘乡高等小学,最后进入近代新型学校——湖南第一师范之路。古代与近代、传统和未来、穷乡和城镇,这多种不同文明和特色的交会点,恰好集中到毛泽东身上,并使他具备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所没有的特点。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照片

求学时的毛泽东,主张“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一直进行冷水浴、日光浴、游泳、登山、体操和露宿等活动,甚至故意不带钱而长途步行当文明“乞丐”,以锻炼自己的身体和意志。这种与中国传统文弱书生完全不同,近似古代斯巴达人的苦行僧式的磨炼,是由于青年毛泽东痛感以天下为己任需要坚强的体魄和意志。毛泽东在以后的戎马生涯中能有过人的精力和一往无前、不畏挫折的意志,正是在此时打下的基础。

处于近代中国政治风潮中的毛泽东虽然长期立志求学,可是标榜“经世致用”的湘学影响,以及他同情受苦人民和决心改造社会的人生目标,又使得他在斗争风暴袭来时不可能与兵事无涉。少年毛泽东就曾同情长沙抢米的“暴民”,视因起义被斩首的哥老会首领彭铁匠为心目中的英雄。当毛泽东年满18岁时,正值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他又马上弃笔从戎,在新军第二十五混



成协(旅)第五十标(团)第一营左队当了半年士兵。这时的毛泽东还不曾想到自己日后会指挥军队,只是革命的激情使他感到从军比读书更为重要。虽然他所在的新军没有上过战场,在军营中他却也受过一个士兵的基本操课训练,据说托4把枪和单个教练的成绩还相当可以,排教练、连教练、营的野外演习也搞过。“凡猛将必起自伍卒”,亲身以士兵身份经历军营生活的实践,对这个没有受过军校训练却在日后担当统帅的人,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军事课目的奠基作用。

由于辛亥革命以南北妥协告终,革命既不存,从军也就失去意义,毛泽东主动退伍回到学校。进入民国后的湘境却再无宁日,南北交通要冲的地位,使湖南中心地带尤其是长沙附近成为军阀们交兵的重要战场及通道,第一师范的书斋里也时闻枪炮声。为保卫学校,校内曾组织了业余的“学生志愿军”,有过当兵经历的毛泽东被选为连长。

1917年南北军阀混战时,北军从长沙败退,其傅良佐部混成旅的部分溃兵乘乱在城南郊抢劫,一时全城恐慌,学校也要学生暂避。这时“连长”毛泽东却挺身而出,指挥愿意听命的一百余名“学生志愿军”和南区一部分警察,只以少数枪械和爆竹出城迎击溃兵。在接近攻击对象时,毛泽东利用溃兵混乱无组织和欺善怕恶的心理,先以开枪和燃爆竹威吓,再施以喊话和许诺缴械即给资遣散相争取,终于使大批溃兵不战而缴枪,从而保证了市区的安宁,也向全校显示了毛泽东的组织才干和谋略水平。这次动用了武力和真枪,却又不战而胜的短途征讨,是毛泽东平生第一次指挥军事行动,结果大获成功。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虽然当过兵,在第一师范又以指挥收缴溃兵枪械一事得到同学们冠以的普鲁士近代军事家“毛奇”美誉,而此时从外表和气度举止看,他无论如何也不像军人,却像那个时代浪漫而又有些不羁的书生。这个高大英俊的男子不大修边幅,经常长发垂耳,也不愿整理内务和遵守作息时间。

毛泽东青年时的志向是“改造中国与世界”,本人的职业选择却长期倾向于教师和报人,希望以讲坛和纸笔来唤起民众。他的一手好文章,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到长沙师范都被老师们称赞不已,在那个时代原可作为头等进身之阶,可是他却视万户侯如粪土,与蔡和森等志同道合的好友一起,以其超众的才华走上一条冲脱世俗的反社会潮流的新途。

进入20年代后,毛泽东经历了由从师孔孟儒学,信崇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康德等人乃至追求日本新村主义的道路,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红色记忆

HONGSE QIDIAN

1920年毛泽东就在长沙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共产党小组,使湖南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源地之一。

1922年5月底,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湖南省成立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为委员长(翌年由李维汉接任),何叔衡、易礼容、郭亮为委员。当时湖南全省共有党员30人,仅次于广州和上海,是全国第三大党组织。1925年9月,全省党员发展到700人。这年年底以前,衡阳、平江等地先后成立了党的地方委员会,长沙、湘潭、常德、宁乡、浏阳、岳州等地相继成立党支部,其他大部分地区也有党小组和个别党员在开展活动。

在共产党力量弱小,国民党在社会上尚有较大影响的情况下,为了进行国民革命,同时发展壮大共产党在湖南的力量,1923年3月间,中共湘区区委根据中共中央西湖特别会议关于中国共产党应集体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决定,作出了从组织国民党入手进行政治活动的计划。

此时,国民党在湖南的组织实际上已不存在。李维汉、何叔衡、夏曦等以中共湘区区委名义同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代表覃振和老国民党员邱维震商议在湖南筹建国民党组织事宜,决定设立筹备处,由何叔衡负责。随后,国民党中央又委派夏曦、刘少奇在湖南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当年9月,已在中共中央任第二把手的毛泽东回湘,在长沙就筹组国民党组织一事与夏曦作了会商。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以后,夏曦受国民党中央委派,在湖南筹建临时省党部。当年4月1日国民党湖南临时省党部成立,夏曦担任书记长。李维汉任临时省党部机关报《新民》周报的主笔。



夏曦

可以说,湖南的国民党组织是共产党人组织起来的,打着国民党的旗帜,很大程度上是进行共产党的理论宣传和工作。当时国民党右派大骂共产党“寄生”于国民党内大力发展,湖南就是典型。

早期的中共湘区委员会的工作重点,是城市的工人运动;共产党主导的国



民党省党部,早期的工作重点是统战工作。而谈到农民运动,则是毛泽东个人开了先河。

湖南农运之火,又恰恰是在韶山点燃。那个山清水秀并在上古演奏过韶乐的地方,正是这位在20年代起就受人尊敬的“润之先生”的家乡。

|| 唐生智网开一面,农运勃兴湖南 ||

于1926年12月返省视察的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在长沙参加完会议,马上提出首先要去湘潭县。1927年1月4日,毛泽东就动了身,沿着熟悉的道路奔向了家乡……

在此大革命蓬勃兴起之际,肩负天下重任的毛泽东绝没有省亲的时间。何况父母在几年前都已仙逝,家里的两个弟弟毛泽民、毛泽覃也出来参加了党的工作,妻子和儿子都在武汉,故乡此时并没有直系亲属。毛泽东要赶回湘潭县特别是自己的老家韶山冲,主要目的并非探亲访友,而是要看看自己在此点燃的农民运动之火究竟产生了什么结果——

正是在两年多以前,即1924年12月,中共中央正准备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夕,担任中央秘书兼组织部长的毛泽东因工作过度劳累,向中共中央负责人请了长假,带着杨开慧和孩子离开了上海闸北区三曾里的中央机关秘密住所返回了湖南老家。

那时的长沙,一片黑暗和沉寂。在地方军阀赵恒惕的统治下,任何“过激”的言论都在查禁之列,就是国民党的活动也被严格禁止,书斋里传来的只是那朗读四书五经的抑扬顿挫之声。毛泽东夫妇带着孩子从武汉到了长沙后,倒是没有引起什么人注意。1925年1月,这对夫妻带着毛岸英、毛岸青两个男孩到了板仓的杨老太太家中,毛泽东先拜见这位现时的岳母



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被选为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和过去的师母，一家人欢欢乐乐地过了阳历年。

2月6日，毛泽东夫妇带着两个男孩，又回到韶山老家。出了湘潭县城后，回乡还有90里山路，两个挑夫为他们挑着沉重的竹箱子，一乘小轿上坐着杨开慧和才两岁多的岸青。穿着一身棉布长袍的毛泽东则牵着4岁的岸英，在路上走着。在外人看来，这位离乡几年的“润之先生”大概是带着大笔财物衣锦还乡了。其实，这是“孔夫子搬家”，竹箱子里面装的是一百多斤书。

老家的景色依旧，乡亲们仍然贫苦万分。毛泽东住进南岸的故居里，一面养病，一面走亲访友。他看望了一些“长衫”人物，如过去的老师李漱清，老学者毛简臣，开明士绅庞坦直等。以毛泽东在外面已当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这样的“大官”身份，能登门去看望他们，已经使这些人感到荣幸万分，昔日的老师都连说：“不敢当！不敢当！”

令乡亲们尤其感动的是，毛泽东还去看望了一些穷亲戚和长工、佃户。他特别看望了堂弟毛泽连一家，并送去一点钱。

对于毛泽连的父亲、自己的二叔，毛泽东从懂事起就有一种替父亲负疚的心理。

记得当初父亲毛顺生为了发财，乘二弟家生活困难之际，不顾母亲和自己坚决反对，竟买下了人家的田地，搞得毛泽连一家几乎贫无立锥之地，吃不上饭，靠着母亲和其他亲戚偷偷接济才勉强活了下去。这件事对少年毛泽东刺激极大，与他后来离家出走并搞革命有重大关系。湖南解放后，毛泽东提到家乡的亲人时第一个就点到堂弟毛泽连，并要当地军政机关帮忙把他送到北京，自己花钱为他治病，以后还长年定期向毛泽连家寄钱。毛泽东在北京见到毛泽连时说过：正是我父亲为发财不顾骨肉之情，乘二叔困难买下你家赖以生活的7亩田，才使我认清只有改造社会，才能杜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寻找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

这次回韶山，毛泽东还无力解救像毛泽连这样的“穷苦农民”，只能送一点钱多少解一点燃眉之急。严格讲来，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还只是个富裕农民，无非是为人刻薄一点，就使自己的亲属受到这样的不幸。看一下韶山，看一下湖南，再环顾一下全中国，受地主豪绅残酷压榨的穷苦农民甚于毛泽连一家者，更是数以亿万计！毛泽东的家庭不是佃农，不租别人的地种，全家人在自己参加劳动之外还雇工，并没有受过什么地主的压迫。可是他从少年起就亲眼目睹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惨景。特别是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惯例，佃农每



1920年,毛泽东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年收获时都要向地主缴纳相当于田里产量一半的租子,逼租逼债时的残酷压榨,使毛泽东从小就产生了同情广大受苦农民大众的心理。

毛泽东这次回故乡时,还特别向家里交代了有关财物的事,说明凡是我们的过去欠别人的,都要还清;别人欠我们的,就此算了。其实以毛泽东过去还算殷实的家境而言,当然没有什么欠款,只在外面有债可讨。此次毛家传出话来:过去凡是乡邻欠的钱,都一笔勾销。

回乡的毛泽东走访看望穷苦乡亲的消息传开,许多人都登门去毛家。在池塘对面的老屋里,毛泽东每日都接待来访者,与他们谈家常,谈时事,特别关心当地的土地状况和农民生活。这时经常到他家的几个人,是毛福轩、毛新枚、钟志申、李耿侯、庞叔侃。

毛福轩过去是本乡农民,后来到安源煤矿做工,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此时回到家乡。可以说,除了毛泽东兄弟外,他是韶山最早的共产党员。这次毛泽东回乡,依靠的最主要的帮手就是他。

至于其他几个人,毛新枚是贫苦的知识分子,钟志申是毛泽东过去的小学同学,李、庞二人是小学教员。严格讲来,他们都不是以种田为生的农民,却在农村生活,最了解当地情况,同时又有一定知识。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动农民的干部,恰恰大多不是农民,而是这样的贫苦知识分子。因为若真是终日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理解先进理论并进行宣传组织反倒要困难得多。



革命年代

HONGSE QIDIAN

毛泽东回乡一个月后,正是依靠毛福轩和毛新枚、钟志申等几个人,组织起第一个秘密农民协会。为了让广大农民参加协会,毛泽东又让杨开慧以“毛家媳妇”的身份出面,利用毛家祠堂开办农民夜校。由杨开慧和秘密农民协会的李耿侯等人当教员,在教农民学珠算、识字这些用得着的基本知识的同时,也讲革命道理。

为了让农民听得懂,毛泽东经常去夜校察看。因自己的妻子出身城市大户人家,是湖南学界名流杨昌济的女儿,过去较少接触农民,毛泽东就特别叮嘱道:

“夜校讲课要通俗易懂,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这样农民才明白。”

在毛家祠堂的夜校带动下,当地很快开办起二十多所夜校。为了有效地领导农民运动,毛泽东还和毛福轩一起介绍毛新枚、李耿侯、钟志申、庞叔侃入党。6月中旬的一天,在毛家楼上,秘密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毛泽东亲自领着他们宣读誓词——

“牺牲个人,服从组织;阶级斗争,遵守党纪;努力革命,永不叛党!”这是韶山第一个党支部,也可以说是湖南农村的第一个党支部,农村革命的星星之火,就此点燃起来。

革命年代人们常说,共产党员好比种子,到了哪里都要生根发芽并长出枝叶。以毛福轩为书记的韶山党支部成立后,马上又向本乡和周围发展党员。到了这年年底,就有了近百名党员。

后人看来,这是个不大的数目。须知,当时湖南全省党员数字只有几百人,全国党员数字只有几千。

发展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开展斗争。当时国内发生了反帝的“五卅运动”,韶山党支部马上打出反帝雪耻的旗帜,到湘潭等地宣传,还组织纠察队设卡,查禁日货、英货。

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国民党分部,吸收了一些进步人士参加,国民党分部实际由共产党人掌握。

当年8月间秋收,因遇大旱收成不好,地主仍坚持收租并囤积稻谷。根据毛泽东的布置,中共韶山党支部马上发动农民协会的成员,组织群众拖欠租谷,并聚众阻止地主把谷子运走。当时豪绅武装团防局组织人强行送谷子出乡,毛泽东就要毛福轩动员起数百农民拦路阻截,团丁们见农民人多势大,只



五卅运动

好让步,并把谷子以平价卖给农民。

韶山的地主豪绅和团防局吃了这么一个大亏,立即警觉起来。过去他们对毛泽东还乡并未在意,此时团防局长成胥成向省政府写了报告,声称这位“过激党”领导人回乡“聚众闹事”。湖南省长赵恒惕接到密报后,马上电令湘潭团防局派兵逮捕毛泽东并予以处决。

事有凑巧,8月28日当天正好是过去敬仰毛泽东且有交情的郭麓宾在县政府值班,他看到县长的办公桌上有一封打开的电报。过去仔细一瞧,他不禁大惊:原来上面写着——

“立即逮捕毛泽东,就地正法。”

郭麓宾表面上不露声色,退出县长办公室立即找到自己在县政府当伙夫的侄儿郭士奎,让他速去送一封信。信上写道:

“泽东兄,事急,省里密电拿你,务须在今晚离开韶山。”

此时,毛泽东正在距韶山不远的谭家冲开会,是毛泽民在老家的夫人王淑兰接到信并火速通知了此事。多年后她回忆说:



红色记忆

HONGSE QIDIAN

“那天下午，泽东同志在谭家冲开会，县里郭麓宾派人送信来到家里，派来的人是竹山湾张满姑的崽，姓郭。送来信后，家里就派人到谭家冲喊了他。他接到信，又用开水泡点饭吃，轿子是我给他请的。泽东同志先给他们讲好，抬的谁？抬的郎中。送轿子的人，只一天一夜就回来了。团防局隔了几天才来捉泽东同志，因泽东同志没在家，只开了些钱就了事。”

当时腐败的地方军阀统治下的政府，办事效率就是如此低下。

毛泽东于8月30日赶到长沙，找到中共湘区委员会的秘密机关，见到了两年前来此接任自己书记职务的李维汉以及自己的老朋友郭亮。他们都庆幸此次脱险，毛泽东则讲述了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并叮嘱说：

“以后区委应多派优秀同志到农村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和发展国民党组织。”

在长沙只住了几天，因当局正在捉拿，中共湘区委员会安排毛泽东速去广州，由郭亮派人护送。就在这几天短暂逗留期间，毛泽东又抽空到青年时代经常游泳的橘子洲头，望着那滔滔湘江水，诗兴大发，回来即写下了著名的《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随后，毛泽东去了广州，在国民政府内担任了要职。当时政府主席汪精卫兼宣传部长，因事务繁忙，让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人虽离开了韶山，毛泽东仍时时心系那里的乡亲和农民协会，于1925年12月底在广州还写信给韶山的中共秘密党支部，送去农民协会章程。在韶山支部的努力下，当地农民协会扩大为湘潭县农会。1926年春天因湖南发生了倾向广州国民政府的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与省长赵恒惕的争斗，农民协会乘机公开活动，并支持唐生智。

唐生智原来是个在南北两方之间看风使舵的小军阀，占据衡阳一带。手下有何键、李品仙、刘兴这三个旅长，都是他保定军校的同学。他为了夺省长赵恒惕的位置，秘密允许国民党活动。其实当时是中共湘区区委在湖南各地帮助建立了国民党组织，通过国共合作的国民党这个组织形式以及公团联合会、省工团联合会、学联等合法团体，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及其走狗赵恒惕的革命斗争。

湖南各界斗争的高涨，加速了湖南北洋军阀的分化，使当时湘军中最大实力派唐生智渐渐靠近革命阵营。唐生智是湖南东安人，字孟潇，是保定军校步科第一期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到湖南军队中，十年间由排长、连长一直升到师长。由于受赵恒惕压制，1926年2月唐生智密派代表与广州国民政府接洽，建立了初步联系。根据当时的形势，中共湘区区委制定了利用矛盾建立反赵联合战线的正确策略。1925年年底，区委派夏曦到衡阳与唐生智联络。1926年1月，又派王基永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名义去衡阳，向唐生智提出了七项最低革命条件，唐基本赞同。1926年4月唐生智率领全师正式宣布集体加入



国民党,归附广州国民政府,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并欢迎北伐军入湘,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就这样从湘南打响。



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广东的北伐军在唐生智的配合下,顺利地攻占长沙。北伐军进入长沙以后,中共湘区区委开始公开活动。区委书记李维汉不待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结束,便匆匆从上海赶回长沙。8月6日和29日,中共湘区区委根据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精神和湖南当前的形势,两次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公布政见,强调湖南省新政府应该维护民众利益,革命军必须与民众结合。号召全省民众结成工、农、商、学各界大联盟,召开乡民会议、县民会议、省民会议,为召集全国的国民会议,接收政权作准备。宣言还提出了停止预征钱粮,废止陋规苛税,没收逆产,铲除贪官污吏,限制高利贷,制定工人最低工资及农民最高田租的限额,保护人民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等民主政纲。

唐生智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当时对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一副极其热情的样子。



当中共中央的军事部长张国焘到他那里去联络时,他开口就说:

“我的军队你完全可以指挥!”

唐生智为了巩固自己在湖南的统治地位,北伐之初对湖南的工农运动也持赞同态度。在这段时期内,唐生智几次向李维汉、夏曦表示:

“湖南省工农运动的经费可由省政府给予补助。”

那时的共产党人对国民党还自愿处于帮手地位,不想在朝而想在野。唐生智却拿出旧军阀的那套办法,悄悄对李维汉等人说,省内有几个很肥的县长之缺,可以给你们选择的“CP同志”(那时对共产党员通常用英文字母简称)。中共湘区区委虽一再谢绝,唐生智还是强派几名共产党员去当县长,这正好给开展当地的工农运动提供了方便。

唐生智这些表现当然不是出于真心,他的部队虽打起国民党旗号,其实也不真正信仰三民主义。唐生智养了一个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姓顾的酒肉和尚,让部下都称其为“顾老师”,由他给全军摩顶受戒为佛教徒,以佛经为维系内部的思想武器。在1926年秋天的北伐战争中,被誉为“铁军”的广东第四军和自称“钢军”的广西第七军在湖南与北洋军打硬仗,唐生智却利用旧关系乘别人打仗之机跟在旁边收编被击溃的旧湘军和北军残部,兵力由1万多人一下子膨胀到10万人,番号也扩大为四个军,由他手下的四员干将何键、李品仙、刘兴、叶琪分别任军长。唐生智不仅成了湖南王,湖北很大一部分也成了他的势力范围。

此时,在南方国民党内部,在军事实力上能与唐生智抗衡的只有蒋介石。这个被“顾老师”预言日后能得天下的唐生智,于是一心反蒋并想取北伐军总司令之职而代之。为了壮大力量,他到了武汉后,又想拉共产党帮助他反蒋。这个身为北伐军西路军总指挥的上将大员,竟然背着左右单独找到中共中央机关负责人,显得非常郑重地说:“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做一个党员。”

这样一个人居然申请入党,令中共中央吃惊,除了勉励他要努力进步外自然不便批准。不管唐生智的动机如何,在北伐初期他允许共产党在其属下地



唐生智